
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

曹 峻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场全民族的抗战,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救国活动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上海宁波帮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

明清时期,上海便有宁波商人活动。嘉庆二年(1797年),以四明公所的建立为标志,以传统商人为主的地域性团体——上海宁波帮(下文简称宁波帮)便形成了。上海开埠后,由于宁波帮人士不断向对外贸易、轮船航运、轻工业品制造等新兴行业开拓,并逐步控制了上海主要的民族金融机构,宁波帮很快崛起。至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宁波帮已演化为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组织核心,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松散团体,成为“上海最主要的中国经济力量”。19世纪30年代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两次进攻及其后长达八年的占领,宁波帮的发展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本文试就这一时期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及战争对宁波帮的影响,加以论述分析。

一 “九一八”及“一二八”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而国民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

[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尖锐。对此,宁波帮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

(1) 建立抗日救亡组织,要求政府抗日

1910年,宁波旅沪同乡会(下文简称宁波同乡会)成立后,宁波帮工商业的头面人物,便一直在同乡会中担任主要职务。同乡会的历任会长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就是著名的宁波帮工商业巨子,而同乡会的理事、监事等职,也一直为宁波帮工商业者所担任。因此宁波同乡会实际成为宁波帮新的核心组织。凭借宁波帮雄厚的经济实力,宁波同乡会在旅沪各同乡团体中的影响力也是首屈一指。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宁波帮工商业者即通过宁波同乡会,出面组织救亡团体,要求抗日。

9月22日,宁波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对日问题。会议决定由宁波同乡会召集各地旅沪同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期团结、领导本市民众,一致对外御侮”。宁波帮工商业者还共同讨论了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同时决定由宁波同乡会首先通电南京、北平、广州三处,“大意恳切各方,速息内争,共御外侮,措词极其痛切”。

在宁波同乡会的发起下,9月25日,在宁波同乡会会址内,召开了各地同乡会抗日救国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抗日救亡组织“旅沪各同乡团体联合会”,并由宁波同乡会与绍兴、安徽、潮州同乡会一起,起草联合会的组织章程。会议通过了组织义勇军案、筹集救国储金案、对日经济绝交案等提案,呼吁各银钱业对日断绝往来、华人退出日机构、抵制日货等。

1931年9月30日,“旅沪各同乡团体联合会”在宁波同乡会内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变更组织名称为“旅沪各地同乡团体抗日救国会”,通过了组织大纲,并发表宣言:“唤起有权者,速拨在任及在野诸良将,合率精兵与暴日作殊死战;唤起有力者,踊跃参加

《申报》,1931年9月23日,“宁波同乡会议案”。

《申报》,1931年9月26日,“旅沪各同乡会开联合会”。

义勇军,受紧急训练,备久战之困乏;唤起有智者,努力国外之宣传工作,打破日欲为东亚主人之迷梦;唤起有资者,捐纳救国金,以增加抗日实力;唤起有志者,实行对日绝交,永不与合作,永不买仇货。'宣言号召各界齐心合力,救亡图存。针对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大会致电南京,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殆欲藉口满洲问题,实行吞并中国,以遂其新大陆之野心,此而可忍,则国亡无日”,呼吁国民政府“当机立断,限令日军撤退,交还被占各地,赔偿一切损失,否则明令绝交,出兵讨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我中华民族生存,而免因示弱而灭亡”。大会又分电张学良及汪精卫等,要求他们团结抗日。针对国民党政府限制镇压民众抗日活动,大会请求当局通令各省市民团体,加紧军事训练,以作备战,“并恢复民众运动,对于各地民团抗日救国运动及组织,尤须予以保障”。针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实行妥协外交,大会又要求当局明令对日绝交,并厉行征兵制。

由于“旅沪各地同乡团体抗日救国会”是在宁波同乡会的召集组织下成立的,而且救国会的宣言、纲领、电文也主要由宁波同乡会参与起草,因而救国会的这些抗日要求,实际也在整体上突出代表了宁波帮工商业者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日主张,反映了宁波帮民族工商业者摆脱了“在商言商”的传统束缚,自发宣传抗日,积极干预政局的爱国精神。他们的活动推动了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除宁波同乡会出面组织团体,要求抗日外,不少宁波帮工商业者,也各自自发地组织参加了一些抗日团体。

早在1931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吉林挑拨中朝关系,屠杀我国同胞,制造“万宝山惨案”时,身为宁波同乡会会长的虞洽卿即发起组织“反日援侨委员会”,并任主席。宁波帮工商业者方椒伯、项松茂等,参加了该会的爱国活动。

《申报》,1931年10月1日,“旅沪各同乡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9月26日,上海八百余团体、20万群众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虞洽卿、方椒伯作为执委列名大会主席团,主持大会通过了13项抗日主张。

11月15日,虞洽卿、秦润卿、乌崖琴、金润庠等甬帮人士列名上海各公团,汇款援助在黑龙江孤军抗日的马占山,鼓励其“奋勇杀敌,为国家争回人格,为民族唤起忠魂”。

宁波帮著名企业家项松茂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但加入抗日救国会,还在其五洲制药厂内组织义勇军一个营,自任营长,分发制服,每日操练,以备中日一旦宣战,参加抗敌御侮。9月23日,项松茂还发起五洲制药厂全体员工捐献一天工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甬帮企业三友实业社也组织了类似的抗日义勇军。

(2) 发起宣传抵制日货

出于保护发展中国民族经济、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宁波帮长期以来致力于抵制外货的活动。许多甬帮企业,如三友实业社、五洲制药厂、大中华橡胶厂等,都是在国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不少还参加了诸如“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等国货团体。“九一八”前后,宁波帮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

1931年7月虞洽卿被选为“反日援侨委员会”主席后,公开主张抗日:“第一步应先从抵制日货办起,并应预备准备金五百万元,至少亦有二百万元,以为抵制日货时之必需费用。”对于以往国货运动屡兴屡衰的教训,他尖锐指出:“如果此次国民对日货仍无彻底觉悟,则亡国无日矣!”九一八事变后,虞洽卿对蒋介石表示:“非归还东北,不停止抵货。”其它宁波帮人士,也大声疾呼经济抗日。

以三角牌毛巾打败日制毛巾而著称的三友实业社,是甬帮企

《申报》,1931年9月27日,“八百余团体二十万群众举行抗日救国大会”。

《申报》,1931年11月16日,“各团体昨日续有巨款汇黑,为马占山犒军”。

《申报》,1931年7月15日,“反日援侨大会准备经济绝交”。

业家陈万运和沈九成所经营。9月26日,他们在《申报》上刊登“救国方案”,认为人心未死,国难可救,呼吁全国工业界“殚心积虑,发挥生产,使国人消费自给,减少洋货的漏洞,持之以恒,国家不患不富强”。

创办有民丰、华丰两家大型造纸厂的甬帮企业家竺梅先、金润庠,在9月29日《申报》头版,刊登了“全国同胞公鉴”,指出:中国是民众的中国,民众均有维护国家的义务及责任,依赖政府推诿瞻顾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跃然纸上。他们呼吁全民开展抗日不合作运动,提出了对日宣战、组织不合作团宣传抗日、与日本经济绝交等八种办法,其中特别强调的是抵制仇货。他们认为,只要不合作运动长期坚持,一致力行,“民气必为之一变,国势自见强盛”。由民族工商业者提出如此完整的救国方案,在当时并不多见。

不少甬帮工商业者通过抵货运动宣传自己的产品。项松茂提出“救国须锻炼身体,爱国须倡用国货”,因而建议爱国人士使用五洲厂的药品和肥皂。经营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呼吁采用日货原料的工厂,将工业原料的名称、用途函寄中国化学工业社工业原料研究部,自当“尽量供应或免费代为研究,期谋适当办法而收彻底抵制之效”。之后,中国化学工业社还指出,提倡国货的根本办法是政治修明、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整治交通、开发富源,在较高的层次上要求保护民族工商业。

宁波帮工商业者,本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在“九一八”前后,宣传抗日,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唤起了民众爱国精神,在上海工商界是较为突出的。其中三友实业社抵制日货,组

《申报》,1931年9月26日,三友实业社启:“救国方案”。

《申报》,1931年9月29日,竺梅先、金润庠启:“全国同胞公鉴”。

《申报》,1931年10月10日,五洲大药房启:“国庆痛语”。

《申报》,1931年10月19日,中国化学工业社启:“采用日货原料各工厂注意”。

《申报》,1931年10月26日,“中国化学工业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织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更引起了驻沪日军的嫉恨,被视为“排日”据点,而屡屡寻衅。1932年1月底,三友社工人与日谍挑衅相冲突,最终导致了上海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宁波帮民族工商业者的抗日活动,是“一·二八”抗战的直接导火索,这是以往史学界所忽略的。

“一·二八”沪战爆发后,宁波帮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中去。

(1) 进一步呼吁全面抗战

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而国民政府妥协退让的危险局面,1932年2月1日,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等甬帮名人,在上海银行界、实业界发起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自发从事维持社会经济秩序、救济难民、支援前线等活动。上海地方维持会还致电南京,质问政府:“对于悬沪孤军,究竟有何援应方法?上海三百万市民,现几濒于绝境,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三百万市民?”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等作为维持会理事,也在电报中列名。当时刘鸿生指出:不抵抗政策,“是自杀政策”,“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希望别人为了正义和公正来挽救我们。救国一定要靠自己,武装抵抗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可是为了国家民族,这是最好的政策”。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宁波帮工商业者中,很具有代表性。

(2) 发起募捐,建立伤兵医院,救助难民

“一·二八”沪战爆发后,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日军的炮火下,遭受巨大损失。宁波帮工商业者通过宁波同乡会,为救济难民、支援前线进行了多次募捐。

2月1日,宁波同乡会在《申报》上刊登了“征集犒劳将士物品

《申报》,1932年2月1日,“上海地方维持会即日成立”。

《申报》,1932年2月5日,“地方维持会为十九路军乞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启事”和“收容闸北被难同乡妇孺启事”。2月4日,同乡会第二次募集救济金:“自沪变发生,吾旅沪同乡困苦万状。连日,本会同乡奔走接洽,加添沪甬行轮……亟需现金应用”,所以呼吁同乡慷慨输捐。2月24日,宁波同乡会第三次募集慰劳将士、救济同乡捐款,以尽量“救济同乡,援助前敌将士,务使国家土地,被难同乡,能在此炮火之下,得恢复安全,以救国尽责。时在今日,毁家纾难,勿落人后”。宁波帮工商业者及大量旅沪宁波同乡,随即响应号召,捐献了大量钱款及药品、食品、衣物、洋烛、草鞋等物,宁波同乡会也出资购办了不少,分别赈难犒军。

为了支持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宁波同乡会及甬帮爱国人士,还出资设立了多家伤兵医院,救治抗日将士。宁波同乡会设立的“第三十四号红十字伤兵医院”,救治了二百余名伤兵,并收到各界不少捐款。四明医院也将一部让出,用作伤兵疗所。刘鸿生与史量才一起,开办了“第四号红十字伤兵医院”,救治了百余名伤兵。方液仙在中国化学工业社内自设“红十字会第二十六伤兵医院”,也救治了百余人。竺梅先在康定路开办的伤兵医院,仅在一个月内即救治伤兵五百多人。宁波帮犒军、救伤活动,直接支持了十九路军的孤军奋战。

出于社会责任及同乡情谊,宁波帮通过同乡会,在“一二八”时期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难民救援活动。宁波同乡会先后在四明公所和法租界一处设立难民收容所,并开办临时医院,收容救治难民九千余人。同时,同乡会还设法加添沪甬班轮,疏散四万余名宁波

《申报》,1932年2月1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征集犒劳将士物品启事”,及“敬告闸北被难同乡”。

《申报》,1932年2月4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募集救济金启事”。

《申报》,1932年2月24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募集慰劳将士、救济同乡捐款通告”。

《申报》,1932年2月25日,“甬同乡会设伤兵医院”。

《申报》,1932年3月2日,“四明医院收容伤兵”。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

同乡回籍,其中由同乡会出资免费遣送的贫苦同乡就达一万余人。宁波帮自发开展的难民救援工作,减轻了日军暴行对无辜市民的伤害。

(3) 继续坚持抵货活动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严厉压制抗日活动,一时日货倾销,几如潮涌,直接冲击了民族工业。在此背景下,宁波帮工商业者还是坚持抵制日货,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如方液仙先是参加爱国实业家组织的“星五聚餐会”,探讨实业救国的方法。在担任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理事后,方液仙又积极联络宁波帮中国化学工业社、亚浦耳灯泡厂等九家国货工厂,在“九一八”周年纪念日共同举办国货联合商场,宣传推广国货,影响空前。之后,方又联合甬帮商人李康年等,创建了中国国货公司,方液仙亲任董事长兼经理,以“中国人应用中国货”为号召,大力推销国产商品。国货公司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设立子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国货联营公司,也成为当时全国国货运动的旗帜。同样,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以“九一八”为商标,生产“九一八”哔叽呢,以推广国货,名噪一时。

1934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的进口税则,有利于日货倾销。对此虞洽卿抨击道:“税则未改以前,我国实业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再受此打击,则日货可以赚钱,国货必无立足之地。中国实业前途,必至破产。”他强烈呼吁:“政府尽量维护实业,民众要彻底觉悟,商家要尽量牺牲,以国货为前提,通力合作,或尚有一线希望,否则亡国可立而待矣。”

二 “七七”及“八一三”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帮义无反顾

《申报》,1934年7月5日,“虞洽卿慨乎言之,国货受新税则打击”。

地再次投入到抗日救国活动中去。

1937年7月22日,上海五百余团体联合组织了“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以“统一意志,整齐步骤,集中一切力量来救国”,宁波同乡会就是其中主要成员。宁波帮工商业者金润庠、裴云卿、黄延芳等当选为该会常委,虞洽卿、秦润卿被选为监察委员,他们参加抗战后援会声援抗日、募集救国捐等活动,做了不少工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战,长达三月之久异常惨烈的淞沪战役展开了。宁波帮以宁波同乡会为组织,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抗日后援工作。

(1) 救助难民

早在1937年7月22日,由于时局紧张,宁波同乡会即建立了特种委员会,着手筹备救济同乡、收容遣送、资助给养等事宜,并训练了一百多名救护人员,较早做好了难民救助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沪战爆发后,由于闸北等战区甬籍居民集中,因而同乡会立即召开了救护会议,决定组织十支救护队,每队卡车一辆,救护员20名,于当天上午立即投入战区难民的营救工作。仅8月13、14日两天,同乡会特种委员会又分别建立了收容、供应、情报、轮船、医药各组,进行全面的难民救助工作。“八一三”期间,宁波同乡会先后在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宁波实业银行、慈乐里等处建立了十四个难民收容所,收容援助了涌入租界的八万多名难民,并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医疗。由于难民剧增而战况又趋恶化,造成难民供给困难,于是同乡会又开始安排难民遣送,同乡会出资租用了四艘轮船,行驶沪甬,免费遣送同乡二十余万人,几占上海当时宁波籍居民总数的40%。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宁波也建立了一个收容所,收容了一千五百余名无家可归的难民。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其危险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除了火线营救常有炮火之

《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务报告·1945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申报》,1937年8月14日,“甬同乡会开始收容”。

虞外, 驶甬班轮也常遭日舰、日机骚扰、袭击, 即便难民收容所也不断受到断水、断米、病疫流行的威胁。

不少宁波帮企业家分别组织参加各种救援团体, 直接开展难民工作。8月上旬, 上海市社会局发动各慈善团体组织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 甬帮人士蒺延芳担任该会常务委员兼财务主任, 负责劝募工作。该会主任潘公展离沪后, 蒺成为代理主任, 实际负责救济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除了亲自参加劝募, 安排难民吃住外, 他还主持开办难民工场、难童学校、难民医院, 组织难民生产自救, 进行难民疏散。租界被日军占领, 救济委员会停止工作后, 蒺延芳仍通过国际难民组织, 为难民提供服务。虞洽卿也在10月间出面组织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 协助全市的难民工作。虞任协会会长, 方椒伯任副秘书长兼劝募主任, 主持该会先后募集了近千万元捐款, 接济了四十余万难民。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的竺梅先, 在其它轮船公司都畏于战火不愿接手难民疏散工作的情况下, 毅然将公司的新宁绍轮投入沪甬难民航线, 不间断地往返十余次, 有力支持了难民工作的开展。其间, 新宁绍轮还将大批布匹、医药器材等军用物资运往浙东, 为抗战作出贡献。此后, 竺梅先还出资25万元在奉化创办了国际难童教养院, 收容教育六百多名难童达五年之久, 其中不少难童陆续加入了新四军浙江分队, 参加了抗战。

(2) 捐助前线及设立伤兵医院

“八一三”沪战爆发后, 宁波同乡会即展开犒军劝募工作, 甬帮人士也积极响应。竺梅先抵押了民丰、华丰造纸厂和宁绍轮船公司的全部股票, 率先捐献了足以购买一架飞机的巨款, 并将家中的金银饰物装满一卡车送至同乡会。至1942年竺梅先病故时, 他已将所有家产无偿捐助给了抗战事业, 无愧于毁家纾难的赞誉。同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53页。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30页。

样,甬帮企业家盛丕华也捐献了家中所有的金银器物,而泰康食品厂的创办者乐汝成则迅速建立了一座临时工厂,生产大量饼干供应前线;宁绍轮船公司新北轮还将五次沪甬航班一万三千余元利润全部捐助伤兵医院。宁波同乡会将先后收到的大量捐款及十余万件捐物,组织了多批慰劳人员,亲送前线犒军。

与“一二八”时期相似,许多宁波帮企业家再次开办伤兵医院。方液仙在胶州路申园设立了规模较大的伤兵医院,聘请名医并派其工厂员工负责伤员联络护送;竺梅先在长乐路主办的伤兵医院,共救治伤兵达四千多名;蕙延芳则联合友人,在南京西路办起了第十一伤兵医院;甬帮颜料商周宗良也在江宁路办了一所伤兵医院;虞洽卿、乌崖琴、张继光等还将原本筹备洽卿医院的三万余元,捐给了伤兵医院;刘鸿生在这一时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兼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及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物资供应总干事等职,为抗战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八一三”抗战中,宁波帮救助难民、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再次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在国家危难面前所具有的崇高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

三 宁波帮的损失及其对工业内迁政策的反应

日军对上海的两次进攻以及其后长达八年的占领,对上海的民族经济打击巨大,其中尤以“八一三”之战破坏为巨。沪东、杨树浦、闸北等当时民族工业集中地区,恰成战场,几乎夷为平地。就全市而言,四分之三的工厂被毁,损失高达30亿元。作为上海主要民族经济集团的宁波帮,其损失是极大的。

《申报》,1937年10月13日,“宁绍公司捐助伤兵医院经费”。

刘念智著:《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5页。

虞洽卿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 1935 年船舶总计九万余吨, 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 13%。抗战爆发后, 公司的三万余吨船舶被沉堵于长江, 所余在战争期间也多为日军所毁。胜利时, 三北公司已残破不堪。

有“企业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的损失更是惊人。他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战前产量占全国火柴总产量的 15%, 在“八一三”战火中, 该公司厂房设备多数被日军炸毁, 所余也皆被日军军管。刘鸿生企业所辖的多处大型码头、墟栈也都为日军摧毁占领。刘创办的上海水泥厂被日军强占后, 在掠夺性生产中破坏严重。章华毛纺织厂、华丰搪瓷厂等, 也都为日军占领。刘氏企业集团实被解体。

宁波帮的其它主要企业, 也同样破坏严重。项绳武的五洲皂厂和药厂, 在被日军强占劫运后, 仅存一具空壳; 余芝卿创办的大型橡胶企业大中华橡胶厂, 在战争初期的损失即高达 500 万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由于日伪进一步掠夺压制, 工厂被迫停产; 民丰、华丰两大造纸企业在被日军占领五年后, 被迫“出租”给日商; 有中国电器业泰斗之称的胡西园, 战前经营的亚浦耳电器厂, 设有四大分厂, 五十余万资本, 列中国电器业之首, 但沪战中, 工厂大半产业被日军摧毁盗运。宁波帮其它中小工商业的损失, 更是难以计数。

由于遭受战争的严重打击, 一度称雄上海工商界的宁波帮已雄风不再了。

另一方面, 由于甬帮民族工商业者对于日军的进攻占领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因而宁波帮本身, 也趋于分化离析。

他们中有的坚持抗日立场, 不与日军合作, 最终以身殉国。如

丁日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 载《历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

刘念智著:《实业家刘鸿生传略》,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82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 42 页。

魏明康主编:《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19 页。

五洲药厂的经营者的项松茂，他在“一二八”时期为前线提供军用药品，并组织义勇军，而为日军所嫉恨。日军捕走了药厂 11 名职员。项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二次深入敌巢营救，以致自己被捕。他在被捕后，仍面斥敌酋，终被日军秘密杀害。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创办者方液仙，在两次沪战中都开办伤兵医院，并发起国货公司，抵制日货。上海沦陷后，方又组织爱国团体“益友社”，且多次拒绝日伪威逼利诱，不出任伪实业部长，终在 1940 年 7 月 25 日，被汪伪特务劫持暗杀。项松茂与方液仙的殉国，是甬帮企业家爱国精神的突出体现。蒺延芳、方椒伯、项绳武、盛丕华、余芝卿、陈万运等不少宁波帮工商业者出于同样的爱国精神，坚持不与日方“合作”，保持了爱国工商业者应有的民族气节。

在工厂内迁问题上，甬帮人士的态度则不尽相同。一些宁波帮资本家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目的，普遍认为内地不适宜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限于战时困难的交通运输条件，在抗战初期，他们对国民政府要求工厂内迁的政策采取迟疑观望的态度。上海沦陷后，他们躲入租界或逃至香港，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也有一些企业家虽然没有立刻响应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但迫于日军占领下的严酷形势，最终还是选择了到后方发展实业，为抗战工作。

刘鸿生在抗战初期曾明确否定工厂内迁的可能性。他认为，“工厂之创立与发展，须适应经济环境之条件”，而内地没有这种条件，因此“将上海大多数工厂迁入内地，犹如鱼入枯井，无以为生矣”，只会“有害全局，将为长久之陷落”。因而他提议创设自由商港以替代内迁计划。上海陷落后，他留在租界，希冀凭借美英势力的保护而东山再起。然而日军步步紧逼，要求他“合作”，还令其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 页。

任伪市商会会长，刘鸿生对此拖延不决。在蒋日双方暗杀的威胁下，刘才被迫于1938年离沪赴港，在香港观望一段时间后，又下决心至后方兴办实业。此后，刘鸿生秘密安排了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先后在重庆、贵州、兰州等地兴办了华业火柴厂、中国火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织厂、西北毛纺织厂、贵州水泥厂、建成水泥厂等不少企业，为后方工业建设作出了不小贡献。

同样，虞洽卿在上海沦陷后，也留沪继续经营航运业。但在多次拒绝日方的拉拢后，他也面临暗杀危险。在重庆多次电催下，虞于1941年离沪赴渝，从事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最后死在重庆。

当然，也有不少甬帮企业家出于崇高的爱国热忱，以及由于经营企业有军事战略价值，因而一开始便对内迁工作抱较积极的态度。经营大中华橡胶厂的余芝卿，于1937年11月，将制造汽车轮胎的机械原料向内地迁移，准备创办云南橡胶厂，以生产轮胎支援抗战，但这些设备在越南被日军截劫。上海沦陷后，余芝卿曾再次计划在内地建设橡胶轮胎厂，后因滇缅公路受阻，建厂计划再次失败。上海亚浦耳电器厂被毁后，胡西园在四川积极兴建了亚浦耳灯泡厂、热水瓶厂、玻璃料器厂、制革厂、化工厂等八个工厂。竺梅先在工厂被日军侵占的情况下，也在昆明兴办了云丰造纸厂，参加后方建设。

毋庸讳言，宁波帮中也有少数大亨投靠日伪，沦为汉奸。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筱庵，早年即与日人关系密切。上海沦陷后，傅出任上海伪市长，为日军的侵略占领服务，并曾多次在宁波帮中活动，胁迫甬帮人士下水。傅最终被军统暗杀。曾任宁绍公司总经理的袁履登，在日伪逼迫下出任伪市商会理事长，帮助日军实行保甲、收刮军粮。抗战胜利后，袁作为汉奸，受到审判。

刘念智著：《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页。

魏明康主编：《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日军的侵略不仅使宁波帮的经济遭受重创,也使甬帮自身分化离析。抗战结束后,宁波帮在上海虽有恢复发展,但同战前的鼎盛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上海宁波帮,关切国家民族的兴亡,具有较高的爱国热忱,同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忧虑,他们也极为关心民族经济发展的命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希望通过组织救亡团体、宣传抗日而干预政局,进行全面抗战。在抵制日货保护民族经济方面,宁波帮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的抗日立场是坚定的。在两次沪战中,宁波帮本着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自发展开了大规模的难民救援及支援前线工作,事迹感人,可歌可泣。同时,日本的侵略对宁波帮打击巨大,甬帮本身也在抗战中趋于分化,其中不少企业家参加了后方的工业建设。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活动的一个侧影,也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部分。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刘兵)